

边纵的建立与迎接云南解放

郑伯克

编者按：原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郑伯克于1987年1月在《云南党史通讯》发表《解放战争时期云南武装斗争概略》一文，其中有关“滇桂黔边纵队的建立”和“迎接解放”两部分，与本专辑有密切关系，特为转载。标题为我会所加。特此说明。

滇桂黔边纵队的建立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广东进军。在云南境内，党领导下的游击队已发展到了3万多人，地方护乡团、游击队和民兵已有10万多人，游击战争遍及全省90多个县，滇池边上的昆阳，昆明远郊的安宁，近郊的大板桥、大小连山等地都有游击队的活动。根据地更日益巩固，有条件的正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在云南已基本上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使国民党省政府的许多县长（约近70人）不敢或不能到任就职。两广解放后，解放大军将直指云南，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云南全省解放指日可待了。

1949年6、7月，华南分局派林李明来昆明，传达分局通知，撤销云南省和桂滇边工委，成立滇桂黔区党委。1949年7

月，林李明，郑伯克到滇东南，8月15日，在砚山阿猛召开区党委扩大会。照分局电示，林李明为书记，郑伯克、周楠为副书记，庄田、朱家璧、张子斋、郑敦、刘清、李雨枫、岳世华等为委员，所属游击队统编为滇桂黔边纵队。任命庄田、朱家璧为正副司令员。云南境内的游击队编为10个支队、两个独立团，任命梁家、林杰、饶华、廖华、刘清、杨江、祁山、何现龙、许南波、黄景文（未到职，实为杨守笃负责）、李德仁、高怀、黄平、陈家震、李鉴舟、张华俊、余卫民、岳世华、温宗姜、董治安、李天柱、孙林等分负政治、军事责任，在广西坚持的游击队编为两个支队，边纵共12个支队、两个独立团。

1949年8月末，区党委在路南圭山挨吹矣会上，决定派郑伯克去昆明，代表区党委处理昆明、滇东北、滇南、滇西、滇北、滇中等地工作，到滇南布置打通滇南和滇东南的联系，并安排周楠经昆明去分局工作。

蒋介石仍妄图以云南横断山脉负隅顽抗，为此，一方面调集第8军、26军、89军及地方部队74军、93军，对“边纵”围剿，分几路向我根据地进攻；另一方面，在昆明制造“九九整肃”事件。在国民党军统局长毛人凤、西南保卫处长徐远举直接指挥下，于9月9日起，几天之内就在昆明逮捕了共产党员杨青田、李群杰等以及民主人士、军工工人共400多人。照毛人凤的话，是“大搞一场”。彻底破坏地下党组织。据解放后徐远举交代：“在所有逮捕的人中，一个共产党员也未清出来，更谈不上地下党组织了。”

针对着敌人的最后挣扎，区党委决定让朱家璧率领主力一部编为西进部队，向滇西挺进，以转移敌人进攻滇东南的目标。在各支队和独立团齐心反击下，粉碎了敌人5个军的“围剿”。

9月中旬，郑伯克在昆明紧急处理工作后即南下到游击区，并保持同昆明市委密切联系。10月17日在滇南阳武召开边纵9、10支队和滇中独立团军事会议，拟定打通两个根据地的进军计划。会后，以10支队为主力，向东南挺进，在胜利进军中，粉碎了地霸武装的阻挠，开辟了红河、元阳两县。

迎接云南解放

1949年3月，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后，遵照中央指示精神，争取用“绥远方式”解决云南问题。形势发展很快，条件已经具备。

1949年8、9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国民党统治已土崩瓦解。解放军第4兵团、第5兵团势如破竹歼灭盘据两广和贵州的残匪，向云南进军。云南地方游击队正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军，阻击残匪。自抗战以来，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即采取争取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在省参议会有党员杨青田（省参议会副议长）、马曜、唐用九（省参议员）等组成的统战工作组，在省工委直接领导下，利用合法关系，团结进步人士、开明士绅和反蒋的军政人员，组成反蒋统一战线，联合反对蒋介石嫡系部队入滇，驱逐蒋系昆明警备司令何绍周，向卢汉（云南省政府主席）提出过要摆脱蒋介石以求自保等意见。

滇桂黔区党委建立后，根据郑伯克和朱家璧的汇报，即派朱家璧、张子斋、郑敦，以“边纵”的名义，同卢汉代表龙泽汇、宋一痕会面，争取其起义。卢汉支援了游击队轻重机枪、步枪、电台、弹药、银元。“九九整肃”后，郑伯克（从滇南回昆明）、郑敦（从滇东南来昆明）与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在昆明会面，同卢汉代表宋一痕联系，仍继续争取卢汉。11月卢

汉经当时代总统李宗仁批准，宣布无罪释放“九九整肃”被捕人员。

蒋介石仍妄图以云南横断山脉地区为其反攻大陆基础。12月初，国民党政府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来昆明，部署将其中央国防部、陆军总部等军事机关转移到昆明，形势十分紧迫，昆明市委经统战工作组（郑伯克到游击区时将统战工作组交昆明市委代管）密切同卢汉联系。12月8日市委根据上级指示，派杨青田按已约定暗号公开政治面目同卢汉联系，商定采取断然措施，对起义作了具体的安排，12月9日卢汉率部起义。郑伯克因工作需要，及时赶回昆明。

蒋介石控制云南负隅顽抗之心未死。卢汉起义后，蒋介石令其嫡系部队第8军、26军反扑昆明，并纠集川康残余部队配合反攻。为了打击敌人占领昆明控制云南的企图，“中央军委即令滇桂黔边区纵队结合当地人民，保卫昆明，又令解放贵阳的第5兵团，以其一部迅速入滇驰援”（见陈赓：《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

遵照中央和刘、邓首长的电示精神，根据卢汉将军的请求，与起义部队建立联系，互相配合打击残匪，郑伯克通知朱家璧，率领“边纵”西进部队驰援昆明。昆明市委发动人民，组织了“昆明市人民义勇自卫总队”，由王维彩负责，武装了几千工农和知识分子，配合起义部队，保卫昆明。

解放大军兼程前进，已到曲靖、沾益，紧逼昆明。游击队配合反攻，昆明人民协同起义部队奋勇抵抗，敌人发现情况不妙，立即仓皇撤退南逃。

在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指导下，解放军4兵团从广西进入云南，歼灭残匪。云南游击根据地军民筹集了粮秣给养和慰问品，修桥筑路，沿途设

站，迎接亲人解放军。在敌人经过的地方，群众坚壁清野，使敌人找不到粮食和带路人，以迟滞其行动。

1950年1月，区党委及“边纵”负责干部林李明、庄田、张子斋（政治部主任）等从滇东南经白色到南宁，郑伯克从昆明经贵州盘县，先后到达贵州安龙，迎接陈赓、宋任穷率领的第4兵团入滇。在安龙，宋任穷主持召开了云南省委会议，听取了林李明、郑伯克的工作汇报。会上宣布滇桂黔区委结束，林李明、郑伯克参加省委领导工作，“边纵”游击队归省军区领导，分别编入分区部队。

残敌从昆明郊区南逃后，朱家璧即率领西进部队及起义部队从滇中南下元江，抢占元江桥头阵地，以配合野战军歼敌；

“边纵”游击队6个支队主力配合野战军阻击逃敌；地方民兵凭险设滚木擂石袭击敌人。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和各族人民的支援下，野战军在滇西南地区全歼敌军第8兵团第8军、第26军3万余人，俘敌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李弥、余程万已在解放军到达之前在蒙自乘机逃跑，其部属归汤尧指挥）、敌军长曹天戈等。残敌仅3000人从金平外逃，600余人从大勐龙、勐宋外逃。接着“边纵”7支队配合4兵团进军西康，参加了西昌战役。

汤尧曾于1950年1月18日委任新平恶霸李润之为“反共自卫义勇军”总指挥，并派第8军107师前去与李汇合，妄图退到哀牢山区建立反共基地。由于游击队与起义部队的进攻，迫使李部投降，敌107师被迫南逃。我第4兵团13军37师在“边纵”9支队的配合下，于墨江官厅歼敌教导师，后于镇沅境内将南逃之107师2000余人全部歼灭。至此，敌人妄图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蒋介石嫡系李弥、余程万所属第8军、第26军在云南的负

隅顽抗，被彻底粉碎了。

1950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第六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我云南人民武装2野一部曾协同卢汉将军进行保卫昆明的战斗，旋以4野、2野各一部由广西赶赴滇南。因为云南有广大的解放区，有久经锻炼的人民军队，有有组织有觉悟的解放区人民，在他们的有力的协同和支援之下，才能迅速地扑灭李、余两匪的叛乱”。

云南解放了！几年来在横断山脉崇山峻岭间浴血奋战的“边纵”指战员们盼望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当游击队和解放军会师时，许多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决心认真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保卫祖国边疆。

往事已过去近40年，这篇回忆只是粗略的素材。由于记忆不详，史料不完备，对各地的叙述，难免详略不等，仅供参考。好在当年参加这场斗争的战友们大都健在，希望给予批评、指正。

云南和平解放前后的几点回忆

曾恕怀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起义。当时扣押了蒋介石的重要将领，并截获飞机十余架，解决了部分中央部队。12月15日，蒋介石驻滇部队第8军和26军围攻昆明，于是发生了昆明的保卫战。我当时任昆明市长，亲身参与其事，兹将解放前后的几点事实叙述如下，以供参考。

云南自龙云被蒋介石解决后的处境和卢汉继任云南省主席的经过

解放以前，龙云在云南执政18年，形同割据，深恐中央军入境。而蒋介石则想巩固他的王朝，实现独霸天下的迷梦。龙云对蒋表面服从，凡事敷衍，于是形成反动集团中地方势力与中央集权的矛盾，暗斗明争，愈演愈烈。蒋视龙为眼中之钉，久欲去之而甘心，乃于1939年以抗日和保卫后方为名，乘机将中央军大量开进云南，也是解决龙云的一个布局。龙慑于蒋的淫威，无法公然抗拒。但在抗日战争后期，敌情变化，云南派出之抗日军队大部回滇。因此当时云南尚有相当实力，装备优良，蒋虽屡欲下手，不无顾虑。迨至1945年8月，日寇战败投降，蒋派卢汉率第一方面军赴越南受降。除中央部队而外，所有云南60军、93军，连同看家部队暂编（19、）23师等，先后入越。于是云南境内仅余下一个步兵师，蒋介石趁机派杜聿明于

1945年10月初武力解决了龙云，将龙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彻底消灭了地方势力。

在龙云被蒋介石搞垮以后，云南已另是一番处境。在解决龙云之时，人民不但饱受惊恐，并吃“清箱”之苦（当时中央军借名“清乡”实际在“清箱”）。蒋介石集团污蔑云南人民为不值钱的“老滇票”，人民受尽侮辱与迫害。如蒋介石嫡系关麟徵、霍揆彰等所镇压的西南联大“一二·一”学生运动和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事件，加深了人民对蒋介石集团的无比痛恨，促进了民主运动的高潮，造成了云南起义的有利条件。

蒋介石解决龙云之初，对当时在越南受降的云南部队和卢汉个人如何对待，不能不作一番考虑。部队既有系统问题，龙、卢又有亲谊关系。蒋介石不让滇人再来统兵，遂将云南部队远调东北为他打反人民的内战，畀卢以云南省主席职位。卢明知是羁縻，亦只好服从。我当时是卢汉的副官长随同在越。记得解决龙云之时是10月3日，蒋曾派何应钦到河内，其目的是来观察动静，表面对卢安慰，实际是加强对云南部队的监视。其时在越南尚有中央军52、53军及93师等部队，蒋介石阴谋毒辣，布置可谓周密。

1946年5月，卢汉命我先行回滇就任昆明市长。他于是年8月弃武就文，回滇理政。

我与卢汉的一夕谈话

1949年初的一个晚上，卢汉约我单独谈话。他首先问我对大局的看法如何？我当时感到诧异。往日见面多谈建设，少说政治，并且他不是素来那样严肃，而是面露和蔼的笑容。我判断他是在解除我的顾虑，并且是诚恳地征求我的意见。我自恃在云南地方系统中，关系既深，他不会对我怀疑，于是就直截

大胆地说，自1947年以来解放各战役中，蒋军主力丧尽，将不用命，士无斗志，闻风丧胆，何能言战。加之蒋介石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物价飞涨，金融即将崩溃，国民党所有措施，尽是祸国殃民，已经到了腐朽没落阶段。民主运动正剧烈高涨，人心向背，实足以致蒋的死命。而解放军则愈战愈强，深得人心。我的结论是：共产党必定成功，蒋介石倒台在即，形势已很显著。

卢汉听了我说，深表同情，并强调要保全地方，不受损失，将来好向共产党交代。其实他早就洞悉时局，已感到大势所趋，不得不决心倒蒋投向人民。卢表面是为地方，实际亦有个人打算。我更是想依靠他来找新的出路。最后他对我说：“现在我们的处境无论在军事、政治、财政各方面，都存在着一一些困难。中央耳目众多，凡事必须审慎。蒋的特务组织妨碍甚大，如何来削弱他们的力量，是极为重大的问题，今后要细密研究，采取对付办法。”

起义前的准备

自1946年8月卢汉回滇主持省政，等于收拾残局，一切都是另起炉灶，虽然蒋介石还给卢任以云南绥靖主任等职，表面看来文武兼管，实际空有头衔，一切受到掣肘，平时已感穷于应付，起而反蒋困难实多。在军事上有中央亲信何绍周当云南警备总司令，留滇部队尚有两个多军的实力，陆空都在他掌握之下。在政治上有国民党省党部，省级各机关中多位置蒋系人员，如教育厅长王政、建设厅长陇体要等，都是CC派人物。在解决龙云之后，卢汉在越受降未归以前，蒋介石又曾委派李宗黄为民政厅长代理省主席。

提起李宗黄，乃为云南省人民所最痛恨者。他是云南鹤庆

县人，早年在云南民主运动中，曾在本市武庙街枪杀过当场演讲的中学生梁元彬。李宗黄充当蒋介石的帮凶，他的行为久为乡人所不齿。此次重返云南，过了几个月的代主席瘾，终于遭到云南人民的反对，立足不稳，才被调走了。

此外，在财政上，重要税源均收归中央，还有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处处牵制。

针对种种障碍，不得不急谋对策。最重要的是当时地方武力仅有少数保安团队，云南武器全被霍揆彰拿走，如何来扩充实力是一个基本问题。自1946年至1949年3年多的时间里，卢汉在“保存云南，巩固后方”的托词下，经过许多周折，才获得批准扩充保安部队，由4个团逐渐增至20个团，编成暂74、93两个军。从中央在滇的五三兵工厂购了不少武器。与此同时，在行政方面，卢在全省各专署和各县大都委任旧属军人以掌握地方武力。在财政上，以人企公司（人民企业公司属于地方组织，久为中央垂涎，在云南人民阻止下未被抢去）和富滇银行为基础，并设造币厂，铸造银元，在省内行使硬币，以抵制中央滥钞。此外又增收地方附加税，以裕财源。

蒋介石驻滇的特务机关林立，妨碍尤多。在绥靖公署中有以沈醉为首的保防处和以李毓楨为首的云南省警务处两大机关，明暗特务遍布全省。以王巍为首的昆明市警察局，直接听命于警务处，在编制上虽属于市政府，而市长就无指挥实权。为了削弱特务的力量，1949年春卢汉将警务处撤销，由民政厅设科管理警务。同年7月，王巍亦在省参议会攻击下，和报纸上公开揭发他的特务罪行后，才调绥署参议。卢汉任命我以市长兼任警察局长，乃将警察保安大队副梁某（忘其名）、4分局长傅汝德、6分局长宋盛玉、8分局长车天喜、外事科长安耀礼、总务科长戴季雍等重要军统特务分子，先后调换。昆明

市的警察才摆脱了特务的控制。我兼任局长数月，事冗不暇兼顾，才保升李志正为局长，对局中纯属特务罪恶组织的刑警大队，当时还不能打草惊蛇，恐影响大事，在起义时除少数脱逃外，余均彻底解决。

在以上这些措施之后，各方面都有了一定的部署，同时亦得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与革命游击武装的联系，倒蒋起义才有了基础。

提前起义的原因

如上所述，云南在起义的准备方面，虽然有了一些布置，但起义的迟或早，选准时机是成功与失败的关键问题。在革命事业节节胜利的现实情况下，云南迟早都必然要解放，如果过迟了成为阵前起义，不太光彩；过早了与解放军相距太远，取不到联系，万一失败，不能保全地方，无以对党对人民。因此必须掌握火候，不能冒险盲动。当时不得不慎重考虑：能拖延时日，准备比较充分，会同解放大军收到夹攻之效，彻底解决蒋介石反动武装。这是预定计划。但由于解放军入川以后，蒋介石为实现他负隅抗拒的计划，已派其嫡系胡宗南部队来滇，即将入境；同时蒋介石、张群及特务头目毛人凤等，于云南解放前，多次出入昆明，加紧了对云南的监视。兼之蒋介石派孙渡、鲁道源等回滇主持军政之说，甚嚣尘上。特别是成都即将解放之时，蒋集团人员纷纷向昆明撤退，先后到达飞机十一架，并将继续空运来滇。值此万分紧急的情况下，事实上已不容许卢汉再作考虑，乃提前于12月9日起义，按照预定计划，采取军事行动，占领机场，截获蒋集团由成都飞来的全部飞机。一面以会议为名扣押和逮捕了重要军政人员张群、李弥、

余程万、沈醉、石补天、徐远举、周养浩、沈燕石（延世）、李副司令（忘其名）等。是日傍晚，五星红旗飘扬于五华山巅，从此云南人民欢欣鼓舞，摆脱了黑暗的统治，得到了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前途。

昆明保卫战中群众的力量

1949年12月9日云南起义之时，昆明市郊的蒋军杂色部队虽作短暂抵抗，终于全部瓦解。但蒋介石尚不甘心死亡，令其在滇部队第8军和26军于12月15（16）日围攻昆明，于是发生了昆明保卫战。

当时蒋军驻扎云南东南。在得蒋军异动情报后，昆明仓卒布防。我军只有一个军在昆，尚有一个军远驻滇西，敌我力量与装备的对比很有逊色。于是缩短防线，加强纵深配备，在官兵英勇抵抗之下，始终坚守了我们的阵地。

在这一战斗中，除军队流血牺牲、英勇抵抗，负了主要责任外，同时亦深得广大群众的支援。起义不久的昆明，匪特尚未肃清，外而应战，内而维持治安，警察虽约有二千，除郊区7、8分局已临火线，英勇协同战斗外，城内巡逻站岗、维持交通、准备消防、任务繁多。幸所有官警已完全站在起义这一边，服从命令，紧密配合保安部队，解除敌人武装，搜捕匪特，在敌机空袭之下，不离岗位，完成了战时任务。

昆明市区辽阔，仍感警察力有不逮。尤其对蒋军主力向南激烈进攻之际，城防兵力单薄，当时幸得中共地下组织林正则同志（即现任电线厂厂长的王维彩同志）组成了“义勇自卫大队”，除护厂护校外，尚有数千人协助了第二线城防。武器不足，由市政府向“临时军政委员会”领发机枪步枪，以增强实

力。除工、农、学生是该队主力外，广大市民群众均多参与，毫不畏难，夜以继日，尽力协助，表现出英勇的战斗精神。反动部队当时以“攻下昆明、自由三天”来蛊惑士兵，并以“拖拉”（外国金币名）作奖。这更激起了全民的愤怒，团结一心，为拥护人民自己的政府而贡献出一切力量。

当时我方战略采取守势，在蒋军猛攻之下，感到工事薄弱，须就环城阵线增筑半永久碉群，以加强抵抗，指令由市政府限期办理。举凡技工征集、器材运输，已感不易，而在敌火下作业，困难尤多。但在解放后工人同志一致努力下，为了保全地方、维护人民利益、弹雨枪林，不顾艰险，尤其在黑夜运输中，有些翻车伤亡，在紧张状况下，工伤事故，时有发生，虽感极端困难，还是遵限完成了这一战时重任。及今思之，这些不可磨灭的英勇事迹如在目前。

昆明保卫战经过几天的剧烈战斗，在军民团结的坚强抵抗下，蒋军贼胆心虚，恐日久胶着，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战到12月20夜间，狼狈地向滇南蒙自、开远逃窜。后来敌人又派空军来昆明轰炸了几日，企图泄愤，使人民生命财产又受到不小的损失，更增加了人民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切齿痛恨。结果在解放军追歼之下，蒋军大部被消灭于滇境，少数逃出国外，战事遂告结束。

（民革中央宣传部文史资料办公室供稿）

（本文作者曾恕怀，云南起义前任昆明市市长。解放后历任昆明市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市人大副主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1983年2月去世。）

昆明盛会喜空前

郭明孝

1950年2月22日，初春的昆明气候虽然还显得有些寒冷，但是拓东广场却是人山人海，热气腾腾。十多万人聚集在这里，连广场西边河堤上也站满了人。个个喜上眉梢。歌声、口号声、拉歌的呼唤声，此起彼落，响彻云空。

主席台红布标上的大字是：“云南各界欢迎人民解放军莅昆大会”。当时我是新华社四兵团分社十四支社的摄影记者。我的同行们早就乘车来到广场，在主席台和周围忙碌地走动。我为了体验一下，也可以说是享受一下被欢迎的喜悦，参加到队列当中，从西郊白马庙徒步走来。我们的队伍整齐地席地坐在会场中央。举目四望，群众队伍中有很多台龙灯、狮子、高跷、戴面具的活报剧。因为广场挤满了人，没有空地，还没有表演，演员们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不时地在原地跳跃扭动几下。我初到云南，分辨不出各种民族的服装，只见妇女们穿着十分鲜艳，绣着宽宽花边的上衣，多采的裙子，还有的戴着绣花的帽子，其中有些人，不断来到我们队伍中献花。茶水服务队的少年捧着热茶，到队伍中挨个叫着“大军叔叔请喝茶！”前天举行入城式，昨天部队休整一天，进行礼节礼貌教育，有的战士还进行了演练。所以今天接受献茶献花的战士，都要向人民敬礼。那时部队的战士，从十四五岁到四五十岁的

都有，小朋友给战士送茶，没想到这些老“大军”会向自己敬礼，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男孩子没接好茶杯，掉到地上打破了。战士掏钱赔偿，弄得这孩子更不知所措。

起义的双翼飞机自东南方飞来，飞得很低，可以看清上边的人。飞到广场上空，纷纷扬扬撒下很多传单，飘到人群中。战士们争相伸手去接。我也接到一张，是给人民解放军的慰问信。飞机飞过去了，一会儿又飞来了，又撒传单。过去我们在战场上、在行军途中，飞机来了，不是对我们投弹，就是机枪扫射。我们的步兵武器打不到它，逼得我们东避西躲。我们恨飞机。没想到今天昆明有飞机向我们撒下欢迎、致敬的传单。战士们读着传单有说有笑，十分开心。有的战士不识字，只把传单摺得齐齐整整，装到胸前口袋留作纪念。我看着飞机心想：要是能坐在上面拍几张鸟瞰这会场的照片，才能表现出这大会的规模之大和气氛之热烈。

一个红色的大气球自广场东南角升起。气球下拖着一条热情的大标语：“欢迎人民解放军！”缓缓地向西北飘去，逐渐飘远了，变小了。第二个气球又升起来，拖着同样的大标语，从我们头顶飘过去。

嘹亮的军号吹起。“部队起立！”整理军容风纪。群众队伍也起立了。我的老师，新华社二野总分社的老摄影记者袁克忠，着急地有些生气地叫我出列：“大会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悠闲地坐在队伍中？”他给我分配任务说：“我负责台上，你负责台下。每个讲话的人、献礼献旗的人，你都问清楚，尽量记详细一些：姓名、讲话内容，准备写照片说明词”。幸亏他给了我这个任务，有当时那个破旧的笔记本保留下来，我今天才能写出这篇短文。

几辆轿车、小吉普车开来，在一片欢呼声中，陈赓、宋任穷、周保中、庄田、朱家璧、李成芳、王启明、朱佩瑄等下了车。卢汉将军走上前去同陈、宋两将军及其他指挥员握手，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一同走上主席台。接着一个穿西装的司仪宣布：云南各界欢迎解放军莅昆大会开始，奏国歌，然后卢汉将军首先致欢迎词。

奏国歌的乐队是第十四军新组建的军乐队。不久前，歼灭白崇禧长官公署的战斗结束，军长李成芳派人到战俘集中地去物色人才。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吸收参加人民解放军，第十四军得以组建军乐队。军乐队的一些解放战士说：“过来后听政治课，说解放军的本质是人民的军队，我半信半疑。进入云南后，亲眼看到人民同军队亲如骨肉，我算打心眼里服了。”

主席台西侧有一部宣传车，我跑过去请他们介绍情况。车上的人引我找到大会“布置宣传组”的一个同志。这个同志对我很热情，实际上他成了我在这次大会采访活动当中的响导和顾问。感谢这位我没有记下尊姓大名的同志！他介绍说：卢汉原是云南省政府主席，于1949年12月9日宣布起义后，任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随即由卢汉致欢迎词。他说：云南各界人民，为了对自己的部队表示衷心的拥戴，特举行这个欢迎大会。承蒙陈赓、宋任穷两将军及各位指战员惠临，云南人民感到无上荣幸。去年11月刘、邓两将军率领的第二野战军向西南进军，迅速摧毁了蒋军在川、黔、桂的主力，把蒋军西南防御体系拦腰截断，使川黔蒋军想逃入云南的企图破产，这样就使云南的和平解放有了有利的条件。去年12月9日云南宣布起义。驻滇国民党第26军、第8军尚图垂死挣扎。直到陈、宋两将军率领第四兵团及四野一部分大军，进军滇南，神速扫荡了顽抗的残匪，云南全境才得以解放。接着，卢汉表示：自起义

以后，云南三迤的父老兄弟姐妹，像大旱之望云霓，渴望解放大军的莅临。今天你们终于胜利地进驻昆明了。昆明人民的兴奋热烈，实非言语文字所能够形容。为了表示我们对大军的拥戴，我们今后誓以至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实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中央人民政府一切法令，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云南而努力，为支援解放西藏、解放海南岛、台湾而努力。

司仪宣布：“欢迎人民解放军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将军讲话”，话音未完，会场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陈赓这年48岁，气宇轩昂，仪表堂堂。他走到台子正中，会场气氛顿时更加振奋。人们踮脚引颈，都想好好看看这位中外驰名的将领。他讲话声音宏亮，精力充沛。他说：今天工人、农民、工商业界、公教人员、各界人民团体成千成万的父老兄弟姐妹，还有很多兄弟民族同胞，从很远的地方来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我感到十分兴奋！陈赓在讲话中提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努力执行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在今年元旦对西南全区人民所提出的三大号召：第一、建立革命秩序，消灭国民党军残余及特务土匪。第二、恢复生产发展生产。第三、开展文化教育工作。毛主席指示生产建设与文化教育是相辅而行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41岁的宋任穷政委讲话。台下群众有人说他文质彬彬，有人说他是儒将。他讲的大意是：云南从此进入了和平建设。要建设一个人民的新云南，这个任务非常沉重地落在我们大家肩上。建设云南的根据是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中国人民的大宪章，也是我们云南人民的宪章。

继续讲话的是一位身穿皮衣、脚蹬皮靴的周保中，他是云南大理人。自九、一八事变后一直在东北抗战，离开云南25年了。他指着台上的人向我介绍：“那位是张冲，云南泸西人，